

邱永漢文學在台翻譯的政治性

——以譯作《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為 考察對象

王惠珍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摘要

邱永漢（1924-2012）是戰後在日第一位榮獲日本直木賞的台裔作家。九〇年代後他的文學在日本學界備受關注，但在台灣的討論度並不高。筆者在既有的研究基礎之上，首先重新釐清他在戰後初期歸返台灣的挫折，探討他如何轉進日本文壇。再則，以他在台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譯本《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作為考察對象，比較原著與翻譯版本之間的差異，進而發現在譯本生產的過程中，因政治性考量作者、譯者、主編自我檢閱大幅刪修，其中包括有關二二八事件和對國民黨政權的批判等內容。因此，造成原著所訴諸的主題失焦，弱化作家的政治批判，導致「去政治」的邱永漢文學譯作成為泛泛的大眾小說，其中具體呈現某種翻譯的政治性。最後，筆者從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歷程觀之，認為他應是少數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腥風血雨的年代中，在日本尋得輿論空間撰寫台灣政治的代表性小說家。當我們重新檢視台灣政治小說發展系譜時，應重新譯出他的作品恢復其政治面貌，填補戒嚴時期的歷史縫隙，藉以恢復邱永漢作為戰後政治小說家的形象。

關鍵詞：邱永漢、翻譯、政治性、小說家、檢閱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Qiu YongHan's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aiwan:

An Analysis of the Translated Work *QiuShui River: Th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Qiu YongHan*

Wang Hui-Chen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Qiu YongHan (1924-2012) was the first Taiwanese writer to win the Japanese Nakisanjūgoshō (直木賞) Prize in Jap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Although highly regarded in Japanes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the 1990s, he has received little attention in Taiwan.

Based on existing research, the researcher clarifies Qiu YongHan's frustrations linked to his return to Taiwan in the early post-war period, and also discusses his transition to Japanese literature. Furthermore, when comparing his first translation, *QiuShui River The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Qiu YongHan*, (《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 to its original, it was found that political factors influenced translation production; as such, the author, translator, and editor-in-chief were subjected to heavy censorship, as were materials that dealt with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or contained criticism of the KMT regime.

Therefore, resulting from both the de-centering of the original work's focus and the weakening the writer's political criticism, the "de-politicized" literary translations of Qiu YongHan have become works of popular fiction – a trend which shows the political character of certain forms of translation.

Finally, the researcher observes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New Literature. Indeed,

he is one of the few representative novelists from the martial period who carved out a space in the public sphere in Japan to write about Taiwan politics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While re-examining the genealogy of the political novel in Taiwan, a re-translation of his literature in order to restore its political appearance would not only fill the historical gap of the martial law period, but also restore Qiu YongHan's image as a postwar political novelist.

Keywords: Qiu YongHan, Translation, Political Character, Novelist, Censor



邱永漢文學在台翻譯的政治性

——以譯作《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為考察對象

我身上同時具備經濟人的精明，和作家的反骨精神及自由奔放，要拋棄任何一方都是不可能的。¹

一、前言

戰後在日本文壇以「台灣」作為書寫題材的作家，幾乎都是大眾文學作家，例如：西川滿、日影丈吉、丸谷才一、吉田修一、邱永漢、陳舜臣等人。2015年東山彰良以《流》一作榮獲日本大眾文學最高榮譽的「直木賞」（第153屆），成為第三位台裔獲獎人士，備受國內外媒體關注。之後，台文界特別追溯這個獎項的前兩位得主邱永漢（1924-2012）和陳舜臣（1924-2015）的文學活動。²然而，在這之前這兩位獲獎作家鮮少受到台灣學界的關注和討論。邱永漢於1955年下半期以〈香港〉一作獲獎，陳舜臣於1968年下半期以〈青玉獅子香爐〉一作獲獎，當時台灣正處於戒嚴時期，邱具有海外台獨運動的政治背景，陳被視為左傾親中的華僑作家，或許因此未能受到台灣文藝界的青睞。邱永漢雖是戰後日本文壇第一位獲得直木賞的台裔（外國人）作家，他也以「文學家」的身分自詡，但是「成功的企業家」的形象卻深植人心，他的文學成就至今在台灣文學史上仍未獲得該有的正視與討論。

邱永漢本名邱炳南，1924年出生於台南，父親邱清海是位實業家，生母

1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台北：永漢出版社，1979），頁220。

2 《台灣文學館通訊》52期（2016.09）企劃專題「文學桂冠，島嶼榮耀——「直木賞」與在日臺灣作家」中收錄了吳佩珍的〈邱永漢的文學路——「直木賞」獲獎前後〉（頁12-16）、陳思宇的〈陳舜臣——跨越國境、難以歸類的臺裔日籍作家〉（頁17-21）等。

堤八重為在台日人。家中多位弟妹因升學之便皆從母姓，享有在台殖民者的特權，唯有長子的他因繼承父姓邱，成為傲骨的「台灣人」。³他「小學校」畢業後考上台北高等學校，1942年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經濟學部。戰爭結束後1946年與妹妹邱素沁相偕返台，短暫就職。二二八事件後偷渡香港，投靠廖文毅（1910-1986）集團，參與海外台獨運動。他雖在港經商有成，1954年4月卻再度輾轉抵日，並投入文學寫作，獲得直木賞後成為專業作家。豈知，獲獎後的邀稿量不如預期只好棄文從商，以投資股票和經營不動產致富。1972年以企業家的身分返台投資，1980年3月為了參加日本參議院選舉而歸化日本籍，但仍沿用「邱永漢」三個字的姓名，最後不幸落選。從這些經歷可知，邱永漢一直對政治運動保有高度的興趣。由於他長期在雜誌報刊上撰寫投資理財相關的文章而被稱之為「賺錢之神」，稀釋了他的文學家身分。

邱永漢文學創作的時間並不長，戰後不斷地旅／居於台灣、香港、東京等地跨境流動，近身觀察積極描寫冷戰前期在東亞流動的眾生相，其中包括台灣的亡命知識分子，成為戰後台灣跨時代不跨語的台灣日語作家。邱永漢在自傳中⁴詳述自己戰後前往日本之前的生命史，細說家庭中的母子關係。邱永漢之所以拒絕將自己的國族認同置於「民族血統」之上，除了和他的混血身分有關之外，或許與他擁有兩位母親不無關係。邱永漢的生母雖然是在台日人，但卻是「妾」身。父親的元配陳燦治未有子嗣，為延續家族香火，他入了父親的戶籍，決定了他得經歷身為「台灣人」所有的悲哀。

養母善於烹飪，對他百般疼愛，以其料理滋養了他的味蕾，培養他對料理食物的興趣，在生活情感上他對養母的親近感更甚生母。母子關係是一切人際關係的源頭，在他的生命中「血緣」顯然並非決定他親子情感親疏的唯一要素，日後在國族認同上「血緣」也非他國族認同的唯一要件。在私領域家庭手足之間雖未見歧視，但在公領域的校園生活他業已備嘗身為被殖民者的悲哀。面對殖民地的種種歧視問題，他仍強烈展現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菁英意識，在升

3 邱永漢父母共生了11位子女，其中一位夭折。大姊邱素娥和他從父姓邱，其他弟妹皆從母姓堤。

4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被二位母親養育〉，《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台北：不二出版社，1996），頁7-26。

學競爭激烈的環境中，脫穎而出一路以優異的成績進入東大經濟學部，不願意屈服於「台灣人」的身分。或許也正因為他如此地優秀早慧，所以對於在殖民體制下，來自日人的歧視也顯得特別敏感，舊制高校生時代的他只能「藉由文學發洩鬱憤，因而沒有正面反抗的情緒。」⁵

然而，當他選擇畢業出路時，卻很清楚「文學」只是他發洩情緒的出口，務實地考量到日後生計的問題，最後選擇經濟學部，希望學成後直接到上海租界大都會從事國際貿易工作。顯然成為文學家並非他職涯的選項，投入文學寫作只是個意外的插曲，叱吒商場雄霸一方應該才是他的人生目標，他終其一生也努力朝著這個目標前進累積財富。然而，他為何抵日後才以「文學」展現他的反骨精神？青春時代詩人浪漫的文學，戰後為何竟成為他積極訴諸反抗和政治隱喻的載體呢？

邱永漢的文學成就在戰後並未引起台灣文學研究者的關注，直到九〇年代才受到日本學者岡崎郁子的注意，並強調他在台灣文學中的特異性，⁶文中她也探究邱永漢的文學在台灣之所以被漠視的原因，親自訪問邱永漢本人，藉以逼視作家的真實面貌，總結出邱永漢「孤獨才子」的作家形象，定位他的文學為「戰後台灣文學的原點」。但是，這個「原點」對台灣文學發展的意義及其承先啟後的關係究竟為何？岡崎並未充分地說明。因此，筆者認為若要釐清邱永漢文學在台灣文學史的意義，或許得重新回到五〇年代冷戰時期亞洲情勢的歷史語境中，方能有效掌握邱永漢文學中移動敘事的歷史脈絡與文學價值。

隨之，垂水千惠的論著也處理了邱永漢的文學，⁷分析邱永漢在高等學校時期的創作活動，並從作品內緣關係推測作品的風格轉變。⁸其中他認為邱永漢早期詩風受到西川滿異國情調的影響，但筆者認為西川滿與邱永漢文學的影

5 同註4，頁23。

6 岡崎郁子著，葉笛、鄭清文、涂翠花譯，〈第二章 邱永漢：戰後台灣文學的原點〉，《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01），頁99-137。另附〈資料——邱永漢作品題解〉（頁138-162）、〈資料二 十五歲的詩人：邱炳南的詩和散文〉（頁163-170）。

7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第二章 年輕的日本語詩人：台灣高等學校時代的邱永漢〉、〈第八章 早到的日本文學家〉，《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02），頁29-46、頁157-168。原著《台湾の日本語文学：日本統治時代の作家たち》（日本東京：五柳書院，1995.01）。

8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第二章 年輕的日本語詩人——台北高等學校時代的邱永漢〉，《台灣的日本語文學》，頁29-46。

響關係應該一直持續到戰後，特別是在台灣原住民族和中國民間傳說方面的小說取材。另外，她也介紹邱永漢五〇年代的文學作品，探討邱永漢對國族認同的詮釋方式。她認為邱永漢最後拒絕把自我認同意識放在民族和血統之上，斷絕與自己所有關係的「亡命者」，才是邱永漢最後為自己定義的自我形象。他是台灣日語文學中，探索與認同日本意識最深刻的作家。這是他經歷過日治末期結束、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激變，孕育出來的認同思想，並且認為邱永漢是「台灣日語文學的完成者」。然而，筆者認為邱永漢的創作活動是「跨時代」的，「日語」在不同的階段各代表不同的認同意識不能等同視之。另外，她也認為在1990年當時的日本文學中尚未見到凌駕於邱永漢之上的經驗與思想，因此將他視為「早到的日語作家」。⁹但，邱永漢跨時代的認同書寫，與其說是他終結日本統治時期血緣認同的問題，不如說他是因戰後在國家認同挫敗中，經驗了歸返挫折才不得不「早到」。

川村湊則將邱永漢和陳舜臣的文學納入在日日本語文學的範疇，說明在日與無國籍文學者的日語文學對於日本文學的挑戰與刺激。他認為《香港》是日語文學中罕見的「亡命小說」，因為作者自身即是「亡命文學者」。邱在《濁水溪》中高度質疑民族認同及其糾葛，他認為陳舜臣的《憤怒的菩薩》在情節的開展上亦隱約可見受到《濁水溪》的影響，只是其中並未見陳對「民族認同」的質疑。¹⁰顯然，川村將「在日」視為一種特殊的寫作位置，藉以擴大日語文學的範疇。

丸川哲史分析邱永漢文本中的控訴、認同等議題。同時，他也指出邱永漢

9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第八章 早到的日本文學家——再談邱永漢〉，《台灣的日本語文學》，頁157-168。除了上述的論文之外，垂水千惠之後也持續關注邱永漢的文學，例如：郭南燕編著，〈戰後の創作活動から見る、台湾人作家にとっての日本語文学：邱永漢、黃靈芝を例として〉，《バイリンガルな日本語文学——多言語多文化な》（日本：三元社，2013.06），頁275-291，討論邱永漢的作為日本「亡命文學」者的意義，與之對比的是黃靈芝的「內部亡命」。垂水千惠著，林姿瑩譯，〈日本人作家丸谷才一如何描寫臺灣「獨立」？——試論《用假聲唱！君之代》〉，洪淑苓、黃美娥主編，《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7.05），頁239-259。介紹丸谷的小說《用假聲唱！君之代》，探究丸谷才一為什麼對在台獨運動感興趣？經垂水的推斷這樣的選材應與邱永漢有關，進而推斷邱永漢應該是這個小說文本的隱藏「參考文獻」。

10 川村湊，〈円の中の夢——在日と亡命〉，《川村湊自撰集 アジア植民地文学編》4卷（日本東京：作品社，2015.10），頁113-123。

試圖召喚戰後被日人刻意遺忘的殖民地「記憶」，然而日本讀者卻依舊裝聾作啞，因而出現戰後台灣日語文學與日本讀者之間歷史想像與經驗的斷裂，「殖民地台灣」成為不願意被記憶的部分。¹¹

和泉司長期關注台灣日語作家在日本文壇獲獎的個案研究，他也以邱永漢的獲獎情況為例，並細究〈濁水溪〉初刊於《大眾文藝》時雖分成三部連載，但單行本《濁水溪》（新小說社，1954）卻只收入其中的兩部，箇中原因和泉認為邱永漢初至日本雖有志成為純文學作家，但因種種因素，為了獲獎不得不調整書寫策略，最後〈香港〉才能如願獲得大眾文學的直木賞。¹² 和泉的另一篇論文〈「国共内戦」と日本、その時の邱永漢：「長すぎた戦争」を中心に〉¹³ 探討邱永漢嘗試以外省人的視角和大眾文學的形式描寫戰後來台的老兵。此時，邱永漢已離台多年，這樣的書寫題材雖是耳聞而來，但若檢視台灣戰後以老兵故事為題材的文學文本，這將是一篇早期的代表之作。

邱永漢五〇年代在日出版的作品集《濁水溪》（現代社，1954）、《密入国者の手記》（現代社，1956）、《香港》（近代生活社，1956），與吳濁流的《アジアの孤児》（一二三書房，1956）等被視為戰後第一波以日語書寫在日出版的台灣文學。¹⁴ 誠如上述，日籍研究者對邱永漢的文學給予高度的評價，並從各個面向展開論述，但在台灣直到近幾年才見到張季琳的系列文章和王永婷的碩論等研究。¹⁵ 戰後邱永漢雖然「不在場」，但「台灣」卻是一直是他文學創作的母題，並在七〇年代末由知名譯者朱佩蘭譯回台灣，但邱永漢的

11 丸川哲史，〈第四章 亡命者のエクリチュール「密入国者の手記」を読む〉、〈第五章 植民地からの逃亡「濁水溪」を読む〉、〈第六章 台湾のポストコロニアル状況〉，《台湾、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の身体》（日本東京：青土社，2000.06），頁93-186。

12 和泉司，〈邱永漢「濁水溪」から「香港」へ：直木賞が開いたものと閉ざしたもの〉，《日本近代文学》90集（2014.05），頁77-92。

13 和泉司，〈国共内戦」と日本、その時の邱永漢：「長すぎた戦争」を中心に〉，《社会文学》41期（2015），頁19-33。

14 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台湾近現代文学史》（日本東京：研文出版社，2014.12），頁4-5。

15 張季琳的〈直木賞受賞までの邱永漢——〈濁水溪〉と〈香港〉〉，《『越境する中国文学』編集委員会編集，《越境する中国文学——新たな冒険を求めて》（日本東京：東方書局，2018.02），頁415-441和〈邱永漢と林獻堂——小説〈客死〉をめぐる〉，《天理台灣學報》27號（2018.06），頁43-65。王永婷，〈生於台灣的亞洲人邱永漢：以《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為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文學為何在戰後台文界討論度不高？九〇年代之後對邱永漢文學的研究為何出現如此外熱內冷的現象呢？

本文首先將說明邱永漢在戰後初期歸返台灣的挫折與逃離，轉進日本文壇後如何尋獲立足之點。再則，將以「翻譯」作為研究路徑，考察邱永漢在台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譯本《濁水溪 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的翻譯現象，釐清邱永漢文學歸返台灣文學場域時，文本如何被「去政治」，其中又折射出怎樣的翻譯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ranslation）？最後，希望在台灣新文學發展史中重新思索定位邱永漢作家形象與文學意義。

二、歸返台灣的挫折與在日的文壇登場

在日本五〇年代是被遣返者和偷渡客的年代，七〇年代前後是在日作家和遣返文學活躍的年代。日本敗戰至韓戰期間在日朝鮮人也因各種不同的原因在返回祖國朝鮮半島後，又再度以偷渡的方式折返日本。因此，當時在日安排遣返的主要港口之一的佐世保港，強制遣返偷渡客的業務比正規遣返的業務還要多，GHQ進而要求日本政府得有效管理非法入境者，因而於1947年5月2日頒布「外國人登錄令」。根據研究者的口訪紀錄，在折返日本的外籍人士當中有多位皆於五〇年代以偷渡的方式抵日。¹⁶ 在小熊英二和姜在彥主編的《在日一世の記憶》（東京：集英社，2008.10）的口訪歷史中亦有多位詳述當年偷渡經緯，其中知名在日朝鮮文學家金石範（1925-）、金時鐘（1929-）皆經歷這個折返過程。

在日台裔知名作家中陳舜臣和邱永漢也同樣在戰後曾一度返回台灣覓職，但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又逃離台灣。陳舜臣的《憤怒的菩薩》即是以歸返台灣時的故鄉台北新莊作為小說的時空背景。邱永漢亡命香港後轉往日本，〈香港〉、〈濁水溪〉、〈偷渡者手記〉中皆是描寫戰後初期至冷戰前期，台灣人在東亞的流亡移動和二二八事件帶來的衝擊，成為描寫在日台灣偷渡客的代表性文本。在日朝鮮作家的偷渡行動與在日朝鮮民族團體關係密切，其中有不少

16 尹健次，《「在日」の精神史1 渡日・解放・分斷の記憶》（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15.09），頁185-201。

人是民族團體中的「幹部」。¹⁷相較於在日朝鮮人的政治活動，日本則是戰後台獨運動重要的海外據點，以知名的台獨運動分子廖文毅為例，1947年他因二二八事件後遭通緝，6月逃亡到上海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抨擊來台善後的魏明道政府，但8月由於上海學潮不斷、社會情勢不穩而轉往香港。接著，他又考量到在香港的台人不多，無法發揮較大的影響力。因此，於1950年2月選擇東渡日本，3月即因「偷渡和從事違法政治運動」之名遭逮捕。之後，他又與在日本橫濱開業的台籍醫師吳振南等組織「台灣民主獨立黨」，1955年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由廖文毅出任大統領，並發行機關報《台灣民報》。當時旅日的台灣人約有二萬五千人之多，法政文科的人才匯聚，因此五〇、六〇年代的日本便成為台灣海外台獨運動的重鎮。¹⁸

邱永漢在他的傳記《私の金儲け自伝》（徳間書店，1971）和《わが青春の台湾・わが青春の香港》（中央公論社，1994）中，陳述了他戰後初期的抉擇和返台、離台到香港的生活。隨之中譯本《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1979）和《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1996）也陸續在台翻譯出版。然而，由於譯出的時間，和社會政治條件不同，敘述內容詳實不一。在戒嚴時期出版的《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中，關於他戰後初期的經歷與逃往香港的經緯，只以三頁半的篇幅粗略地敘述概況，相關人物的名字皆遭刪除。除此之外，根據筆者的核對歸納，可知只要涉及二二八事件、海外台獨運動、批評國民黨的相關內容皆遭刪除。除了原著內容多處遭刪除之外，十五節的小標皆進行微調或改寫，〈後記〉變成〈前言〉，同時增加〈為中文版寫序〉和〈台灣回歸記〉。其中，「為祖國台灣而寫」的段落全遭刪除，例如以下這一段：

最初的出發點是從主張台灣是否是中國的領土，都應該舉行住民投票聽聽台灣人的意願開始，我就成了A級國家通緝犯。父母去世時無法返鄉見面，即使到目前為止仍無法回去。但我並不後悔。為何如此，那是因

17 同註16，頁201。

18 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11），頁1-5。

為身在像日本這樣言論自由的國家，作為台灣出身的文字工作者，就自然是令人稱羨的特權。為了因發表言論就遭致生命危險的人，身為享有這樣特權的人，想說的是，我負有擔當發言人的義務。托這個使命感的福，或許我得付出終身無法返鄉的重大犧牲，度過流浪的人生。但換言之，也可以說如此一來它也教導了我，在這塊土地深耕從頭開始生活的方法。¹⁹（筆者自譯，下線筆者）

邱永漢以此明志，可見當初他在日的書寫活動是充滿政治使命感的。相較於1979年的《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1994年出版的譯作《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中，更清楚地交代他與海外台獨運動人物的往來狀況，例如：廖文毅兄弟、莊要傳等人間的互動細節、偷渡走私的始末等等。

日本敗戰後，旅京的邱永漢與學長郭秋煌隨即於1945年8月22日相偕去拜訪當時因發行軍事公債出差，滯留東京的總督府主計課課長塩見俊二，兩人向他陳述對台灣未來的不安。²⁰此時，邱永漢和一般台灣的海外留學菁英一樣，認為台灣已經從殖民地統治中解放出來了，1946年2月興致高昂地返台準備貢獻已學，尋求機會開創新事業。然而，當時台灣的政經情勢非如他所預期的狀況，閒賦在家的他鋌而走險在日台航路上進行砂糖走私的勾當，但結果卻都失敗。最後，經東大學長林益謙的介紹，只好進入華南銀行新設的經濟研究室擔任研究員，升調至調查課課長餬口，並完成他的博論〈生產力均衡論〉。

二二八事件後他以南下相親為由，向銀行請假返鄉，由台南轉往香港結識廖文毅，在香港起草「台灣實施公民投票」請願書寄送至聯合國，爾後隨即返台。但見台灣政治情勢日漸嚴峻，1948年搭機逃往香港，結束他兩年不到的返台生活。

他抵達香港隨後投奔廖文毅等人所組的台獨運動集團，為賺取生活費撰寫英文稿件寄送至《遠東經濟評論》，或替偷渡到香港的移民擔任嚮導。²¹邱

19 邱永漢，《私の金儲け自伝》（日本東京：徳間書店，1971），頁18-19。

20 塩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密錄·終戰前後的台灣》（台北：文英堂，2001.11），頁8-9。

21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88-108。

永漢在台北高校時代雖已嘗試寫作，在西川滿主持的《文藝台灣》和校刊《翔風》發表詩作，但在留日期間卻並未從事文學創作。生活日漸穩定後隨之在香港成家立業，卻見昔日同志陸續離開，事業又遇瓶頸，為了替女兒治病之需，讓他毅然決然折返前帝國日本，希望賣文維生尋求發展。

移居日本之前，他已先著手聯繫在日的親友，抵日前他先將稿件〈密入国者の手記〉（〈偷渡者手記〉）寄給西川滿，西川受託在長谷川伸主持的新鷹會同人聚會上讀稿，這篇作品當場獲得山岡莊八和村上元三的讚賞肯定，並在《大眾文藝》上刊出。抵日後他就此加入新鷹會，陸續在《大眾文藝》（1954.01）發表作品。²²《大眾文藝》這本雜誌是西川滿重返日本文學界的重要刊物，他藉由新鷹會建立自己的文學網絡，同時也積極分享這樣的社會資本給戰前《文藝台灣》的同人。例如：他也特邀立石鐵臣繪製自己刊於《大眾文藝》的〈ちよぷらん島漂流記〉的插畫。邱永漢抵日後西川滿熱心居中協助，甚至還細心地特別寄送日本專業作家使用的滿壽屋稿紙給邱永漢，希望從海外寄來的日用稿紙能引起選者特別的關注。²³

1954年1月於《大眾文藝》（14卷1號）邱永漢以丘青台（西川滿為他取的筆名）發表〈密入国者の手記〉，該作並成為「大眾文藝募集小說入選作」，編輯者如下記錄了這篇作品的入選經緯：

某天有篇稿件從香港以航空信件寄到本社編輯部。一讀，文中深刻地顯露出台灣人的民族悲哀，內部蘊含著許多問題，相信它是近來的佳作，編輯委員會因而決定推薦。二二八事件在當時國內的新聞也做一部分的報導，但這一篇是初次由台灣青年自己的手將事件小說化的文章，想必會引起迴響。²⁴

22 中古治夫，《大眾文学への誘い 新鷹会の文士たち》（日本東京：文藝社，2006.05），頁7-9。

23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頁45-47。

24 著者不詳，〈大眾文藝募集小說入選作《密入国者の手記》作者略歴と推薦〉，《大眾文藝》14卷1號（1954.01），頁23。原文：「ある日、航空便で、本社編集部あて香港から、原稿が寄せられた。一読、深い台湾人の民族的悲しみがにじみ出ており、内に幾多の問題を孕んでいる点、近來の佳篇だと信じ、編集委員会にて推薦することにした。二二八事件は、時わが国の新聞にもその一部が報ぜられたが、台湾の青年自体の手によって小説化せられたのは、これが初めてである。必ずや反響を呼ぶことであろう」。

隔月的〈文藝時評〉針對這篇論文又提到：「丘青台的〈偷渡者手記〉是描寫從本島脫逃的台灣青年，即使來到日本也不免遭到被強制遣返的命運，無法回台灣的『東洋的二十五時』。特別是讓我們知道終戰後的台灣實情，在這點上相信它是篇珍貴的小說。」²⁵可見，評論者非常肯定這篇小說的題材及其話題性。作者邱永漢也認為：「如果說，這篇小說打動了這些職業作家們的心，我認為箇中原因不在於小說本身的結構、技巧或優秀的表現，而在於我欲向日本有良識之士控訴的激動熱情。」²⁶這篇小說的寫作動機是由於王育德戰後非法偷渡到日本自首，一、二審判決的結果皆被要求強制驅離。邱永漢得知這個消息後，在最高法院審判之前以請願書的形式向判事提出請願申訴，該內容即是這篇小說的題材，文章中深切地傾訴台灣人的立場與心情，最後王育德獲判在日居留許可。²⁷這是戰後第一篇台灣作家以二二八事件為題材的作品，該作入選讓邱永漢達到欲透過「文學」進行政治控訴的目的，也再度燃起他成為文學家的夢想。戰後前殖民主國的日本文壇提供他輿論空間，初登台的第一篇小說即富有政治抗議的意涵，飽含後殖民文學的政治喻意。

邱永漢的文學才華備受新鷹會前輩作家們的賞識，因此《大眾文藝》14卷8號到10號繼續連載他的〈濁水溪〉三部作，並在第11號的《大眾文藝》上隨之預告單行本的發行，「刊載三百五十張稿紙的大作，在我們的雜誌界中是少見的。即使是雜誌空出這麼多的篇幅給不可知的新人，是個大冒險。但，結果卻是非常的不錯，它因檀一雄氏的推薦，即將由現代社印出。」²⁸之後，邱永漢陸續發表多篇隨筆於《大眾文藝》之上，多次與西川滿相偕出席在長谷川仲家中舉辦的座談會。小說〈香港〉接著榮獲第三回新鷹會賞，並連載於《大眾

25 著者不詳，〈文藝時評〉，《大眾文藝》14卷2號（1954.02），頁65。原文：「丘青台の『密入国者の手記』は本島を脱出した台湾青年が日本へ來ても強制送還の運命を免れ得ず、台湾へは帰れぬ、『東洋の二十五時』を描いております。とりわけ終戦後の台湾実情を、われわれに知らせてくれた点において貴重な小説と信じます。」

26 邱永漢，〈才能があるからガンバレ〉，《私の金儲け自伝》，頁41。

27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187-188。姑且不論這篇小說的刊出對判決且有多大的影響力，但這個事件卻成為邱永漢在日第一篇政治小說作品的題材。

28 著者不詳，〈文藝時評〉，《大眾文藝》14卷11號（1954.11），頁48。原文：「三百五十枚の大作を掲載したことは、我が雑誌界では、稀有のことであり、雑誌としても、未知の新人にこれだけの紙面を割くことは、大冒険ですが、結果としては大変良い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それは檀一雄氏の推薦で現代社から上梓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ことです。」

文藝》（16卷8-11期），在《大眾文藝》的大力推薦下，〈香港〉才有機會入選榮獲《文藝春秋》的直木賞。

日本近代文學中鷗外、漱石之後，日本文壇主要的純文學作家以東大畢業者或東大中退者居多。²⁹ 因此，邱永漢除了在作品中展現自己的文學實力之外，也善用自己東大畢業的「學歷」和校友關係累積社會資本，例如：他抵日後借助東大學長郭德焜之名，結識當時的暢銷作家檀一雄（1912-1975），在他的引薦下結識佐藤春夫等文壇知名大家，佐藤春夫還特地為《濁水溪》題字，他也毛遂自薦將小說集寄贈給當時的文壇前輩大家，其中，意外地收到林房雄的讚譽與鼓勵。³⁰

邱永漢將上述的新鷹會的主持人長谷川伸和佐藤春夫視為文壇的恩師，每年總是寄送新年賀卡問候，並到府上致意。兩位恩師辭世之後，長谷川家仍有其紀念聚會，但佐藤家卻在兩三年後卻門可羅雀。即使如此，他仍恪守義理人情，如常帶著妻子前去上香問候甚為周到。³¹ 早慧且精明的邱永漢抵日後「苦節」兩年後，即在31歲獲得直木賞的肯定，〈香港〉獲獎時的餐宴中純文學和大眾文學作家雙方陣營皆前來祝賀。然而，他即使如此華麗登場，獲獎後邀稿量並未因此大增，只好試著撰寫評論和財經雜文，畢竟在日本文壇三個字姓名的外國人作家立足不易，因此不得不改變撰稿方向與策略。³²

在日台獨運動的領袖廖文毅曾在《文藝春秋》四月號（1955.04）上發表了〈祖国台湾の運命——蔣政權をセント・ヘレナに流せ〉（祖國台灣的命運——把蔣政權流放到聖赫拿那島），試圖透過日本的雜誌媒體喚起日本輿論界對台灣的關注。邱永漢獲獎後繼之在《文藝春秋》四月號（1956.04）發表〈日本天國論〉，文中對照蔣氏政權統治下的台灣，期待日人珍惜當前的自由。五〇年代台灣的話題性因為他們的積極撰文才得以在日本全國知名的綜合雜誌刊物上曝光，邱永漢的獲獎除了作品本身的質地之外，與當時日本輿情對台灣人的同情與政治性的關注或許多少有關。邱永漢在日的文學活動本身一開

29 小谷野敦，《文學賞の光と影》（日本東京：青土社，2012.10），頁188-189。

30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頁55。

31 中古治夫，《大眾文學への誘い 新鷹会の文士たち》，頁8-9。

32 同註30，頁63-65。

始就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積極地發表以戰後台灣和香港為舞台的小說，並撰寫評論為台灣人請命，但隨著日本的經濟高速成長，邱永漢的文學逐漸喪失話題性。他也敏感地掌握時代發展的趨勢，搖身一變成為「賺錢之神」。

然而，當時台灣的報紙媒體又是如何介紹他的獲獎呢？邱永漢獲獎消息在台流佈的情況，只見當時《聯合報》中央社東京於1956年5月24日專電報導此項消息：

據悉：一位本籍台灣的中國作家，經被提名的「直木文學獎」的受獎人之一。這位中國作家為邱永漢，現年三十二歲，他的被提名為獎人，係因他的題名「香港」的著作，那是一個長篇，自去年八月起至十一月底止，在著名的文學雜誌「大眾文藝」連載。邱永漢為台南市人，畢業於東京大學經濟系，為東京市居民。³³（下線為筆者）

報導中邱永漢一再被稱之為「中國作家」，且未提及他參與海外台獨運動的背景或小說內容。據說由於這位報導員殊不知邱永漢的政治背景，竟因這則新聞而被革職，³⁴ 這則新聞就此不了了之。有關邱永漢的報導直到1972年才重現在台灣媒體版面上。當時他應行政院院長蔣經國之邀，以海外企業家的身分返台投資，《聯合報》連續兩天大篇幅地報導專訪他的旅日經歷等等。³⁵ 之後，邱永漢在台的各項投資亦備受媒體關注，他除了設立工業區、高爾夫球場之外，1973年成立永漢出版公司，根據1977年3月23日的報導，他也在台設立「求美畫廊」，希望藉以培育本土年輕畫家，³⁶ 丸谷才一《用假聲唱——君之代》畫商人物的設定，似乎與邱永漢的商賈活動有關。「永漢國際書局」於1979年8月1日在台北開幕，以販售中、英、日語書籍為主，成為台灣日語世代

33 著者不詳，〈台省籍作家邱永漢在日被提名受獎〉，《聯合報》，1956.01.25，3版。

34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頁19。

35 在《聯合報》（1972.04.03，3版）上刊出〈十四年鄉土之戀 重回故里興奮親切 在日聲名極盛·開闢投資教室／高級財務顧問·家喻戶曉之士〉、劉復興，〈文壇健筆·經濟長才！永漢譽滿東瀛 做生意件件成功·從餐館到大企業／寫文章樣樣精通·小說贏得直木賞〉、〈從小說寫到食譜 邱永漢著作等身〉。隔日繼續刊出于衡的〈聽邱永漢聊天〉，《聯合報》，1972.04.04，3版。

36 王文龍，〈繪畫沙漠之上 已經出現綠洲 邱永漢的求美畫廊正在起步 巧妙耕耘培育必有豐美收穫〉，《自立晚報》，1977.03.23，5版。

重要的獵書之地。³⁷可見，他除了經濟方面的投資之外，亦將部分資金挹注投資於藝文事業上。2000年之後他的名字較少見報，直到2012年5月19日《聯合報》才再度刊出他逝世的消息。除了上述政商活動的報導之外，其實邱永漢的文學譯作早在七〇年代末就曾連載於台灣的報紙媒體副刊之上，但為什麼文學家邱永漢的形象一直未能深植在台灣讀者內心呢？

三、戒嚴時期邱永漢文學的譯介與傳播

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國民黨政府遭逢一連串的外交挫敗，1972年9月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轉而與中華民國斷交。國民黨政府在此之前為了掌握穩定的海外資金，1972年4月力邀邱永漢返台投資。海外遊子仍渴慕返鄉，已經站上歷史轉角處的他選擇順勢而為，決定返台。然而，他對國民黨政府的招降仍充滿疑慮，在返台前特地拜託好友中央公論社的鳴中鵬二，囑咐返台後他若遭不測被扣押，請鳴中務必出手相救。同時，他也特別帶了《週刊新潮》的記者同行，³⁸希望藉由日本媒體的輿論力量保身。

邱永漢與本省籍文人社群的互動，早在他返台的同年11月25日，台灣歌壇的吳建堂醫師便邀請他與《笠詩刊》同人敘餐。據說當時他搭乘情治單位的座車抵達，看到聚會的餐廳特別貼出「『歡迎旅日企業家邱永漢蒞臨本餐廳』時，曾苦笑說：若是在日本，企業家不值錢，一定會寫『歡迎文學家邱永漢』，文學家才是一流的心靈。」³⁹顯然當時他仍在意自己的「文學家」身分。但是，他返台後與省籍作家文學集團並未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據說創辦《台灣文藝》的吳濁流曾向邱永漢募款卻被他一口回絕。⁴⁰吳濁流因此撰文責問：「他歸來數次，據新聞報導，皆是大談經濟，不談文化，真使文化界詫異不已，我想：一個有成就的前輩作家，豈可以賺錢至上，對後輩指導的事，似

37 巫，〈永漢國際書局 日前開幕設備新型〉，《自立晚報》，1979.08.18，9版。

38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頁197-199。

39 李魁賢，〈文學家才是一流的心靈〉，《笠詩刊》186期（1995.04），封面。

40 岡崎郁子著，葉笛等人譯，《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頁115。

乎也有其責任和義務吧。」⁴¹ 岡崎從上述的文章推論，邱永漢因為得罪文壇耆老吳濁流，所以他的文學才被拒於台灣文學之外的原因之一吧。⁴² 其實，從上述的邱永漢在台的投資項目，可知他非常重視台灣文化產業的投資，箇中原因似乎不單純只是他與本省籍作家的個人恩怨。

邱永漢並未忘情文學，他將自己的日文作品委由知名翻譯家朱佩蘭譯出。根據朱佩蘭的回憶，當年永漢出版社的經理透過聯合報報社和她取得聯繫，並與邱永漢夫婦相約在永漢國際書局大樓地下室的餐廳見面，由於朱佩蘭的夫婿游禮毅與邱永漢曾同時期在東京留學，餐會中兩人互動良好相談甚歡，因此邱永漢口頭同意譯者可將他的作品自行中譯。據說九歌的蔡文甫先生雖曾徵詢邱永漢希望中譯他的作品，但他卻指定要由朱佩蘭譯出。除了邱永漢的作品之外，朱佩蘭也譯出另一位台裔作家陳舜臣的小說，這些譯作的產出皆因作者對譯者的信任與肯定。⁴³ 根據筆者查閱如附錄「邱永漢著作在台中譯刊行出版概況」，朱佩蘭不只負責翻譯邱永漢的文學作品，自傳性隨筆與商業性文章皆出自她的譯筆，九〇年代前邱永漢的作品多由永漢出版社印行出版，之後才改由允晨文化出版。

邱永漢戰後的日語小說皆發表於日本文學場域，作家試圖藉由這些作品讓「日本」讀者理解戰後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人處境，政治控訴的色彩濃厚。當這些作品藉由「翻譯」重新歸返台灣時，「台灣」讀者究竟讀到怎樣的譯本？根據朱佩蘭的記憶和筆者的查閱，〈敗戰妻〉、〈濁水溪〉譯文先後刊於《台灣日報》後再集結成冊，翻譯費由台灣日報社提供，刊完後再由永漢出版社出版發行並收入於永漢叢書。⁴⁴ 〈敗戰妻〉的譯文與仲正的評論〈可悲的日本女人：〈敗戰妻〉讀後感〉（1978.03.29，第12版）並置刊出，這是難得一見有關邱永漢文學的評論。接著，同年八月《台灣日報》又再度連載他的〈濁水溪〉，在正文之前編輯的一段文字可知，主編將〈濁水溪〉置於抗日文藝的脈絡，將它視為「台灣的知識分子反日本殖民政政策及渴慕回歸祖國懷

41 老頑固（吳濁流），〈借問！邱永漢先生〉，《台灣文藝》39期（1973.04），頁1。

42 同註40，頁116。

43 根據朱佩蘭女史回覆筆者的書信內容（2018年10月4日），謹此誌謝。

44 朱佩蘭女史提供筆者的訊息（2019年3月18日信件），謹此誌謝。

抱的情形」之作，至於對於小說後半部有關他決意逃離台灣的內容卻隻字未提，從中亦可見主編的政治性裁量。又，〈女人的國籍〉連載在《自立晚報》（1981.07.01-08.13，第10版），1982年先由永漢出版社出版，1995年又改由允晨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見，邱永漢雖然與省籍作家社群刻意保持某種距離，但他的小說卻連載在當時較具反抗意識本土色彩的《台灣日報》副刊和《自立晚報》副刊之上。

另外，邱永漢的文學在台之所以未受到讀者關注，葉石濤認為是：「由於他長久沒有和台灣文學活動發生聯繫，又一貫用日文寫作，所以對台灣文學的影響不算大。這要全怪，台灣翻譯人才缺乏，沒有予以語譯推廣的關係。」⁴⁵的確，邱永漢在海外流亡期間以日語創作未與台灣社會發生直接的聯繫，但在七〇年代末即由朱佩蘭譯出多本著作，自1979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說選集《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陸續有多本譯作出版，不能說譯本不足。

七〇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前後戰前台灣日語作家的作品陸續被整理譯出，1979年遠景出版社出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以全集式系統性地整理譯介台灣日語作家作品。⁴⁶邱永漢的文學譯作也置身於這一波譯介台灣日語文學的風潮中，但卻未受到該有的關注，或許是因為他屬於「光復後」的日語作家。然而，最直接的原因可能與譯本生產、傳播的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採作家集體現身的方式進行宣傳，譯作多數先刊於報刊、雜誌等媒體上，同時再配合葉石濤、鍾肇政、黃武忠、羊子喬等人的評論引薦給戰後的中文讀者，成為長銷全集。然而，邱永漢的作品被譯出連載後，似乎未見接續的相關評述與系統性的介紹，他的譯本只能孤懸於台灣日語文學之外。

邱永漢因為「流亡」而離開「鄉土」，在冷戰前後的東亞區域內亡命，他的人生經歷遠超出同輩文學青年，積蓄相當豐富的創作能量，抵日後大約兩天就可以寫一篇短篇小說。⁴⁷戰後他在日本、台灣、香港之間跨境流動，小說人物亦多置身社會邊緣，面對因移居而面對嚴苛且迫切的生存問題，或因政治選

45 葉石濤，〈序〉，《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頁6。

46 王惠珍，〈析論七〇年代末台灣日語文學的翻譯與出版活動〉，《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期（2015.04），頁251-290。

47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頁59。

擇而被迫離散移動。他不只寫台灣本省人的跨境離散，也書寫國共內戰結束跨海來台的外省人（〈長すぎた戦争〉）、被遣返的日本人（〈敗戦妻〉）、原住民少女（〈蘭嶼少女〉）。〈毛澤西〉是描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逃離到香港的難民，〈客死〉則是描寫因政治流亡到日本的台灣人、〈看不見的國境線〉（〈見えない国境線〉）描寫從北平移居香港的美國婦人黃太太等。邱永漢五〇年代所處理的文學題材和形塑的人物，皆因政治性因素被迫離散。因此，他的文學實難被單純的以「國族認同」、「鄉土文學」等強調認同意識、主體重建的台灣民族主義文學所收編化約。換言之，他藉由小說形塑出東亞各種「離散」的典型性人物，與力主台灣意識和鄉土題材的省籍文學集團中出現了嚴重的「政治不正確」的隔閡。

戰後邱永漢因逃離台灣而「不在場」，又因「日語」因素和海外台獨運動的資歷，戒嚴時期歸返台灣文學場域是有其政治風險的。背負著龐大的經濟利益的「商賈」邱永漢為避免招惹政治事端，不得不謹慎地處理在台發行的中文譯本，然而這些譯本卻是邱永漢文學在台受容的關鍵性文本。戰前台灣日語作家抗日強度因人而異，在國民黨「抗日文藝史觀」的大原則，和重新認識台灣的歷史條件下，經評論者的轉譯闡釋，中譯本漸為戰後中文讀者所接受討論。然而，戰後的邱永漢的日語作品卻直接挑戰台灣當權者的統治權威，文本中隱藏了諸多政治禁忌，例如：親日、左翼閱讀、批判國民黨政權、台獨意識等，在戒嚴時期如何刪譯順利出版，對作者、譯者與出版社而言都是一大考驗。王永婷已在碩論〈生於台灣的亞洲人邱永漢：以《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為例〉的第四章〈《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的刪略情形〉針對《小說選》的6篇小說〈濁水溪〉、〈敗戦妻〉、〈故園〉、〈毛澤西〉、〈蘭嶼少女〉、〈傘中女郎〉進行中、日文核照，檢視「允晨版」刪譯的情況，並在論文中指出前行研究⁴⁸皆使用1995年「允晨版」作品進行討論，卻未發覺中譯版

48 李昀瑾，〈自我認同的糾葛與分裂：以邱永漢《濁水溪》為考察對象〉，《台灣文學評論》8卷1期（2008.01），頁6-19。邱麗敏，〈二二八文學研究：以戰前出生之台籍作家對「二二八」的書寫初探〉（新竹：新竹師範學院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台灣語言與語文教學碩士班，2003），頁122-134。

本刪修等問題，⁴⁹但她卻未再進一步針對「永漢版」與「允晨版」這兩個中譯版本進行核對比較。

《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的〈後記〉中提到：「〈濁水溪〉對我來說，是包含著許多回憶的作品。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在本書裡並未全部譯出。然而，現在重新翻閱，覺得全篇充滿申訴的熱情，現在無論如何再也寫不出這種格調的作品了。」⁵⁰根據朱佩蘭的說法，她翻譯時先進行刪譯，並知會作者，刊出之前主編會再行確認才會刊出。由此可知，這些譯作應是在邱永漢應允默認下進行的改譯，他與譯者在改譯的過程中，也建立某種信賴默契。⁵¹誠如前述，在日出版《濁水溪》時邱永漢已遭刪改過一次，他自言是接受檀一雄的建議刪除第三部分的一百多頁。⁵²又，和泉司根據〈大眾文藝月評〉（1954年11月號）的評論，曾有評論者指出第三部欠缺統一，給人內容混亂的印象，再加上第三部內容涉及當時（1954-1955）正在日本進行的台獨運動動向。因此，在考量五〇年代中期日本與美國政府對海外台獨運動存有疑慮等因素，為了避免出版過程引發政治性問題，事先採行了自我檢閱而刪除這一部分。⁵³同樣地，〈濁水溪〉中譯的過程亦出現政治性考量，導致日文原著與中譯本內容出現嚴重差異。經筆者核對連載於《台灣日報》收入於「永漢版」（永漢出版社，1979年）的〈濁水溪〉和「允晨版」（允晨出版社，1995年）的〈濁水溪〉中譯本，因解嚴前後政治環境改變，再次出現版本歧異的問題，其中刪訂現象大致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全書篇幅刪減的情況

1995年4月允晨出版社重新出版，同樣以《濁水溪》為書名，同樣由朱佩蘭譯出，其中只收錄了〈濁水溪〉和〈客死〉兩篇。「允晨版」冀求忠於原著

49 王永婷，〈生於台灣的亞洲人邱永漢：以《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為例〉，頁56-86。

50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後記〉，《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台北：永漢出版社，1979），頁203。

51 根據筆者電話訪談，朱佩蘭的回覆（2019.03.25）。

52 邱永漢，《邱永漢短篇小說傑作選——見えない国境線》（日本東京：新潮社，1994），頁9。

53 和泉司，〈邱永漢「濁水溪」から「香港」へ：直木賞が開いたものと閉ざしたもの〉，《日本近代文学》90集，頁85。

譯出日文單行本的12個段落，但仍見闕漏。1979年「永漢版」的〈濁水溪〉只譯出全書的前七個半段落，譯至戰爭結束後，主角「我」毅然決然地拋下個人兒女私情滿懷憧憬地返國，因為「新的世界在等待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能夠叫做祖國的國家，在海的那一邊向我招手。船尚未啟航，我的心就已經離開了日本。」⁵⁴小說後半段描寫返台後當時的社會現況、二二八事件、逃往香港的經緯等內容全遭刪除，更不見「曾經那樣憎恨的日本，如今變成遙遠的夢中國家。」⁵⁵的字眼。

（二）小說內容細節的修訂

「允晨版」除了修訂中文字句和誤譯的幾處之外，前半部重新譯出的內容如下，可歸納如下：

1. 有關汪精衛政權和毛澤東言論的敘事

小說中有關汪精衛和毛澤東的敘述文字一律遭刪除，例如：

汪先生是名符其實的偉人，直至政權成立之前，還說若能給中國帶來真正的和平，他自己願意退出政界。由於汪先生逃出來，所以重慶政權內部也發生大地震。那時候，如果有意簽訂和平條約，即有機會締結。
（「允晨版」，頁19）

即使蔣介石和毛澤東或汪精衛互相競爭，與他們也有一脈相通的地方吧。正如英雄識英雄或流氓抓得住流氓的心理一樣。（「允晨版」，頁70）

2. 有關魯迅的敘事

小說第三段的一開始描寫回到東京的「我」因讀了魯迅傳記後，想和許

54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濁水溪〉，《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頁200。

55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濁水溪〉，《濁水溪》（台北：允晨出版社，1995.08），頁125。

多中國留學生一樣，棄筆從戎保衛祖國與日本帝國主義奮戰。然而，如下這一段魯迅棄醫從文的經歷在「永漢版」全被刪除，而抗日報國的敘事則被保留下來。

我想起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求學，再過一年就畢業的時候，在學校的講堂看電影，演日俄戰爭的故事，有個在滿州做俄軍間諜的中國人被日本人處刑的場面，中國人同胞在旁邊看熱鬧。看到這種場面，魯迅痛切地覺得一國的興亡，不在於國民的身體健康，精神健康才是重要。於是決心以筆改造中國人的精神而奮然放棄學業到東京去。讀著他的傳記，我開始懷疑繼續讀死書有甚麼意義？（「允晨版」，頁31）

3. 有關閱讀左翼書籍的敘事

在「永漢版」中除了不該出現的人名被刪除之外，不該出現的書名一併清理。如下：

所選讀的書是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魏特雷蓋的《解體過程中的中國經濟與社會》之類，陳氏（筆者按：陳超平）對這些書加入公式化的注釋，向學生們說明。

「中國的建設由社會主義開始，最後只有成為共產主義。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因為中國尚未到達資本主義的水準，故必須經過與資本家協力的新民主主義階段。所以到達最後的理想之間，非與資本家妥協，且某種程度的利用資本家不可。」（「允晨版」，頁50）

其實我的藏書中有兩本當時的禁書：考茲基的《農業經濟論》和列寧的《資本主義在俄羅斯的發達》，這是德明從一位前輩那邊借來的。（「允晨版」，頁38）

顯然邱永漢自身對左翼思想包括經濟理論等有一定的閱讀涉獵，才能舉出這些東西方左翼思想家的論著等，但在戒嚴下這些內容皆遭刪除。

4. 其它

最後，可能文本中引起誤讀爭議的段落，為避免招惹麻煩，也被一併刪除，如下：

前不久和一位本島人談話，這個人時赴大陸做生意，他說如果是日本人就方便得多。我聽著他的話，覺得到了台灣人認為做日本人比較好時，問題就簡單了。（「允晨版」，頁10）

然而，愛與自私的戰爭卻還沒有結束。與人類歷史無法切割的這場戰爭，我們未曾坐上衛冕者的位子上。（「允晨版」，頁78，筆者參考原文譯出，文責自負）

「想當日本人」、「戰爭還未結束」等字眼皆可能挑動檢閱官的神經，因此一律刪除。1994年的「允晨版」雖修訂「永漢版」誤譯箇所和微調遣詞用字，增譯上述日文原著未譯出的部分，但，根據王永婷論文的整理「允晨版」還是仍有九處還是未自原著被譯出，⁵⁶可見至今中文讀者所閱讀的〈濁水溪〉仍非完整版。筆者再進一步核對漏譯箇所之出處，發現都集中在「永漢版」前七個半段的範圍內，「允晨版」漏譯的部分可能是出自於譯者重譯過程中的疏忽。根據刪譯的內容反推，可知「永漢版」的〈濁水溪〉相當符合戒嚴時期政治性的規範，控訴日本殖民統治、建設祖國台灣的本，也切合邱永漢當時經濟救台的愛國者身分的光環，充分展現翻譯的政治性。

除了上述的〈濁水溪〉之外，《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中所收入的作品，只要觸及民族認同、敏感政治議題的段落，皆被刪訂。邱永漢在台第

56 王永婷，〈生於台灣的亞洲人邱永漢：以《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為例〉，頁56-59。

一篇譯出的小說〈敗戰妻〉是描寫台灣男子徐義新前往嘉義購買走私砂糖，借住日式房舍時與準備被遣返日本前的灣生女子南美子之間發生的一段婚外情。在性別隱喻中殖民地時期的義新只能如愛慕公主的黑奴般，遠望著日本女性，呈現某種殖民地男性的自卑感。然而，日本敗戰後翻轉了日、台之間的權力關係，「若非日本敗戰，大概不會出現這樣可憐的表情」（「永漢版」，頁9）。但是兩人的相逢時已預知終將別離，義新畢竟自知是有婦之夫，美南子終將被遣返，這場短暫的邂逅，充滿著淡淡別離前的哀愁與無奈。在改譯的過程中，政治不正確的「親日」段落、攸關認同、情慾描寫一一被刪除，例如：

原文：「張寓」と台湾人の表札がかかっているが」（「新潮社版」⁵⁷，頁5）

中譯：門牌是中國人的姓氏「張寓」（「永漢版」，頁75，下線筆者）

原文：現にこうして向い合って座っている南美子に何となく親しみを感ずることが出来る。敗戦は不思議な効果をもつものだ。（「新潮社版」，頁79）

中譯：現在對這樣相觀坐著的美南子總覺得親切，敗戰帶來不可思議的成效。（以下中文筆者自譯）

原文：着物が好きという心理うらには日本人に対する郷愁のほか、もっと具体的な意味がある。着物を着た女と一緒にいることで、彼の思いが一層はっきりした形で遂げられることになるからだ。折角、実現するならもっと完璧な形であって欲しいと願うのは無理のないことであらう。（「新潮社版」，頁84）

中譯：喜歡和服的心理，除了對日本人的鄉愁之外，更有其具體性的意

57 日文引文頁數主要是根據邱永漢，《邱永漢短篇小說傑作選——見えない国境線》（日本東京：新潮社，1994）。

義。因為與穿和服的女性在一起，讓他的想法更清楚成形。如果特意實現的話，希望是更完美的形式，這是有可能的期望。

原文：一ヶ所、千近くも砂糖袋の積上げられた地主の家によったが、役人がその前に来て調べて行ったとかで面倒なことが起きっては、と買うのをよしてしまった。（「新潮社版」，頁88）

中譯：有一處，他路過堆著近千袋砂糖的地主家，但因為之前官員前來調查而帶來麻煩，因此買賣就此作罷。

原文：恥ずかしがる女から羞恥のヴェールをめくる残酷な愛の遊戯に、彼は夢中になった。（「新潮社版」，頁89）

中譯：他專注於從害羞的女性掀起羞恥的面紗，這樣殘酷的愛的遊戲中。

〈敗戰妻〉在《台灣日報》刊出後，隨即出現一篇由仲正撰寫的評論〈可悲的女人——〈敗戰妻〉〉，從內文大致可判讀這位「仲正」的身分應該是外省籍讀者，仲正來台曾參與遣俘工作，文中還沾沾自喜地敘述他們如何「劫收」日人物品。他對於當時在台流行的日本大眾小說很不以為然，但認為日本的純文學作品尚可讀。文中提到「雖然作者是中國人邱永漢，卻是典型的日本文藝小說。……。讀這篇作品用不著靜靜思考，就能感覺出日本女子的溫婉、體貼，隨隨便便，無可奈何。」⁵⁸顯然他並未意識到作者「台灣人」的身分和殖民地經驗，對小說中的日本女人的行徑充滿道德性的批判。文末他還是相當肯定邱永漢的文學才華，認為他從商殊為可惜。

〈故園〉主要描寫孤獨的楊老頭因戰爭和家人接二連三地去世，家運由盛轉衰的經過。這篇小說主要是以邱永漢的故鄉台南建國路（民權路）為小說場景，包括棺材店和運河夕陽等等的故鄉地景。小說也帶出戰後初期台灣政局

58 仲正，〈可悲的女人——〈敗戰妻〉〉，《台灣日報》，1978.03.29，12版。

的動盪、省籍矛盾、和返鄉青年陷入失業困境等種種社會問題。楊老頭的兒子返台失業又走私失敗（邱永漢自況），最後因台灣政局不得不逃離台灣避難東瀛；女兒竟與外省男性談戀愛受阻（據說邱永漢的妹妹邱素沁嫁給台電的外省籍工程師⁵⁹），但在中譯本中這些反映戰後初期社會問題和省籍矛盾的段落全遭刪除，例如：

原文：政府と意見が合わないために外国へ行ってしまったが、本当は親孝行な息子なのだ。その息子を自分のもとから引き離してしまった政府なんか糞くらえ、と大きな声で罵った。毎日同じことを言うので、医者の方でしまいにききあきて、注射がすむと、患者を待たせているからと云い訳をしてすぐかえってしまうようになった。（「新潮社版」，頁271）

中譯：（他兒子）因為與政府意見不合，而跑到國外去。但事實上他是個孝順的兒子。他大聲地咒罵讓他兒子離開身邊的狗屁政府。因為他每天重複說同樣的事，醫生已經聽膩了，一打完針，就以還有病人候診為由馬上回去。

原文：父親に一言の挨拶もなしに、どこの馬の骨ともわからぬ男と一緒にになったこともそのひとつだし、その相手が息子を外国へ追いやる原因になった外省人であったこともそのひとつである。（「新潮社版」，頁275）

中譯：全然沒跟父親打招呼，和來路不明的男人在一起，這是理由之一。對方是讓兒子被趕到海外的外省人，也是原因是之一。

楊老頭認為兒子的出走和女兒與外省男子往來皆因國民黨來台，導致他晚年孤苦，但譯文中只要出現描述有關楊老頭對國民黨（外省人）的怨懟與憤恨

59 葉石濤，〈離台前的王育德〉，《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台北：翰音文化公司，1999.09），頁34。

之詞，皆遭刪除。

〈毛澤西〉是描寫在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後，從上海逃難到九龍在麻油地碼頭無照賣報的中國難民。作者雖語帶幽默地刻劃這位小人物，但同時也帶出香港難民衍生的社會問題與生活窘境。五〇年代香港是亞洲最大的難民移住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人口約有164萬的人口，日軍占領時期減至60萬人，戰爭結束後人口逐漸恢復。但因國共內戰，1949年12月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為了避免戰禍而逃往香港的難民多達45萬人，五〇年代爆增至220萬，因此出現嚴重的居住等民生困境。⁶⁰「他們付不出昂貴的房租，也沒有可以投靠的地方，所以捲縮在別人的騎樓下，或樓梯角落過夜。」（「永漢版」，頁70）。邱永漢亦是政治難民置身其中，近距離地觀察這群從中國內地流亡之民在港的生活實況。

然而，經由改譯卻讓作者在譯作中積極地展現「反共立場」和對「自由中國」的回歸態度。在日文原文中平鋪直敘：「大陸で共産党がしだいに勢力を拡張しはじめた一九四八年を境として」（筆者自譯：共產黨在大陸的勢力逐漸擴張，以一九四八年為界，「新潮社版」，頁421），但中譯本卻改譯成：「從共產黨肆虐人民的一九四八年以來」（「永漢版」，頁69）。如下箇所原文亦遭刪除：

原文：その頃、上海の奴らは俺のことを蔣介石と呼んでいたよ。じゃ毛澤東の天下になったって、上海から逃げ出さなくてもよかったじゃないの。（新潮社版，頁428）

中譯：那陣子，上海的人們叫我蔣玉石。成為毛澤東的天下後，非從上海逃出來不可。

原文：俺は毛澤東先生には何の怨みもない。怨みはないけれど、上海で新聞を売るのはご免だね。（「新潮社版」，頁429）

60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頁16。

中譯：我對毛澤東先生並沒有怨恨。雖然沒有怨恨，但在上海賣報紙就免了。

作者使用戲謔的方式調侃「偉人」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名字，可見他在日的書寫立場既反對國民黨極權的治台方式，亦不認同共產黨政權的自由主義者，但這樣的嘲諷文字經考量後全遭刪除。在中譯本的文末再增補上：「由此可想而知，人們渴求自由的願望是多麼強烈。」（「永漢版」，頁70）強調自己追求自由主義的政治立場。

戒嚴時期台灣文壇較少處理台灣原住民題材，邱永漢或許是受西川滿文學選材的影響，為滿足日本讀者對台灣原住民的異國想像和閱讀樂趣，參閱國分直一有關紅頭嶼的研究寫了一篇〈海の口紅〉之後改名為〈蘭嶼少女〉。⁶¹但邱永漢並不全然以描寫部落生活和原住民神話為主，而是描寫戰爭結束後，純情原住民少女如何被日本士兵磯野欺騙感情的經緯，蘭嶼少女卻癡心地計畫前往日本找尋磯野，但最後竟被台灣男人煽動為愛流浪到台東，轉而被賣到娼寮的故事。1980年代救援原住民雛妓問題受到社會高度的關注，但戰後初期原住民女性因家庭生計問題，被拐騙到都會工作已時有所聞。描寫戰後有關人口販到原住民地區買賣少女的社會問題，這篇作品應算是先驅之作。然而，「永漢版」的這一篇卻是僅次於〈濁水溪〉被大幅刪改。「永漢版」的〈蘭嶼少女〉只譯至日軍因戰爭結束被遣返為止，至於少女被騙至台灣島的後半部內容全被刪除，或許如此才能符合戰後國民黨的抗日文藝觀吧。

〈傘中女郎〉主要遭到男性始亂終棄的妓女復仇的鬼故事，由於它是篇鬼話傳說，其中充滿虛構性未牽涉台灣現實，是唯一未被增刪更動的小說。

《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是邱永漢第一本在台出版的小說集，但因為忌諱國民黨政權，而將它重新「去政治」，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窘況，二二八事件等人民不滿的聲音皆遭抹除，在日控訴國民黨極權統治的力道也弱

61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頁203。這篇文章或許是指國分直一1952年在日發表的〈終戰後の紅頭嶼（蘭島）調査〉，《台灣考古民族誌》（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79）。

化許多，作品只剩下的內容多為「安全」的，符合抗日文藝觀的大眾娛樂性小說。八〇年代台灣文學政治小說盛行，邱永漢的〈濁水溪〉、〈客死〉、〈偷渡者手記〉、〈香港〉等多涉及台人海外台獨運動的政治小說，反覆闡述海外台獨分子者很重要的立論點「混血血統論述」否定「血緣決定論」，其中未被譯出的〈看不見的國境線〉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邱永漢的國族認同意識。小說中的主角美國女性因教會關係前往中國北平，並與黃姓中國醫生結婚成為黃太太（中國稱謂），收養中國女孩卻名叫艾莉絲（美國姓名）。艾莉絲長大後決定與英國外交官結婚而先到香港。最後沒有血緣關係的母女既不回北平也不去英國而選擇定居香港。顯然，對於長期移居台灣、東京、香港的邱永漢國境線無關乎血緣、國籍而在於土地認同。這樣的認同方式理應受到戰後重新肯定「鄉土認同」的台灣讀者青睞才是。但在譯本生產的過程中，翻譯成為一種文化政治的行為，《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因政治性考量，作者、譯者、主編層層的自我檢閱大幅刪修，導致文本所訴諸的主題失焦，弱化文本中作家的主體意識和批判性。因一再妥協的結果導致邱永漢的文學在當時的台灣文學場域欠缺可議性，特別是八〇年代台灣本土小說家不斷挑戰歷史禁忌與政治議題，政治小說大量產出時，邱永漢文學的歸返內容顯得平淡無奇，實難引起該有的關注。

四、結論

邱永漢戰後初期返台因二二八事件逃離台灣，投身海外台獨運動，經香港折返日本，經西川滿的引薦在長谷川伸的新鷹會同人等協助之下，展開他「為祖國台灣而寫」的文學活動，他的文學創作顯然一開始便充滿政治性的訴求。然而，在日從事台獨運動並非易事，「他們不但被日本警察監視，護照亦被國民黨政府大使館控制，不能隨便行動，只有選擇以賺錢為目標。」⁶² 1972年經商有成的他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返台，「賺錢神仙」的身分讓他在台投資安然無恙。他自認為：「幸運的是我能在生前返回故國，且是在年齡上尚能做事業

62 王育德，〈台僑為獨立之母〉，《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07），頁71。

的時期回來的，……，在我的背後尚有因政治活動而被槍斃，或在綠島被監禁的人們。台灣的將來如何，問題也仍未解決。」⁶³ 經歷殖民地統治和海外流亡，再度返台後的邱永漢，政治熱血已不復當年，也只能如此隱晦地期待政治受難者的問題可以獲得解決，同時他也不得不承認「現在無論如何再也寫不出這種格調的作品（筆者按：〈濁水溪〉）了」。⁶⁴

他的代表作之一〈濁水溪〉在日本戰後占領時期和台灣戒嚴時期，皆歷經多次的刪修與檢閱審核，才得以順利印行出版，「去政治」的結果讓它面目全非，返台的〈濁水溪〉甚至慘遭腰斬。除了〈濁水溪〉之外，多篇作品皆無法完整被譯出，作為五〇年代在日台灣人代言者的邱永漢的政治訴求沒入於譯文之下。然而，「去政治」不也是一種「政治」嗎？重新檢視譯文版本的核對，可見戒嚴時期出版的譯本需要經歷多重的自我檢閱，成為政治正確的作品後才能安然出版。但，唯有讓這些被刪除的內容重新浮現，邱永漢的政治批判之聲才能清晰可辨，並恢復其文學的政治性。

邱永漢文學創作時間雖然不長，但他基於親身的經驗與見聞，大量地處理戰後五〇、六〇年代冷戰前後在東亞離散的題材和邊緣敘事，在這層時代意義上，他的台灣歸返文學文本和偷渡客文本具有其一定的歷史意義與貢獻。返台後他雖然積極地重新出版自己的譯本，期待自己的文學成就重新回到故鄉被台灣讀者理解閱讀。但，文學歸返的過程似乎並不順利，除了戒嚴時期言論箝制的問題之外，同時遇到種種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包括他與本土文學社群的疏離、作品欠缺系統性的評論介紹、題材欠缺回歸現實的鄉土味等等，都影響了譯作的傳播與評價。然而，最大的問題仍在於中文譯作的內容本身，因為在這些文學譯本中處處可見「去政治」的痕跡，其中只要涉及國民黨政治的批判、二二八事件、海外台獨運動之處皆遭抹除，以致於這個時期的文學譯作充滿翻譯的政治性。如今重新檢視這些譯本後，發現邱永漢文學的政治性訴求欲掩彌彰，反而更加凸顯出邱永漢文學文本的政治性。

若從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歷程觀之，他是經歷二二八事件創傷的「世

63 邱永漢，朱佩蘭譯，《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頁220。

64 邱永漢，朱佩蘭譯，〈後記〉，《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頁203。

代」⁶⁵，在台灣島內處於白色恐怖腥風血雨之際，少數在日本尋得輿論空間批判台灣政治情勢的文學家。相對於島內在二二八事件後，備受壓抑而悶啞的知識分子，他在海外卻積極以文學的形式介入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敘事，探討台灣人的認同困擾、抗議國民黨威權的壓迫和追求台灣獨立的政治理想，展現他的反骨精神，聲嘶力竭呼籲日本社會「不要忘記台灣」，成為五〇年代在日台灣文學的代表性作家。然而，在經歷脫殖民地祖國認同失敗、台獨運動的挫折、歸化日本籍選舉敗選後，他或許早已體認到「民族國家」的虛妄性，而選擇當個「亞洲人」，因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在未來的世界裡人們只會有故鄉，但不再有國家的區別。⁶⁶

邱貴芬認為從台灣日治新文學發軔以來，從賴和到黃錦樹，小說家書寫殖民暴力、認同的困擾、威權的壓迫、資本經濟的剝削、種族的傾壓、政治理想的虛耗，「政治小說」儼然是台灣文學創作的大宗。⁶⁷ 當我們重新建構台灣政治小說發展系譜時，邱永漢文學若能重新譯出恢復其政治面貌，他的作品將能填補戒嚴時期的歷史縫隙，邱永漢身為在戰後東亞追求自由奔放的政治小說家的形象，將更形立體而鮮明。



65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06），頁24-33。

66 邱永漢口述，楊森整理，〈我是台灣出生的亞洲人——只有故鄉、沒有國家的新文化時代〉，《財訊》267期（2004.06），頁74-77。

67 邱貴芬，〈序論 政治小說：勾勒願景與希望〉，《台灣政治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事業公司，2006.08），頁9-20。

附錄 「邱永漢著作在台中譯刊行出版概況」

書名	出版事項	備註
《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	台北：永漢出版社，1979。 *初出處：《台灣日報》〈敗戰妻〉 （1978.03.28-29，12版）；〈濁水溪〉 （1978.09.18-10.03，12版）。	永漢叢書
《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	台北：永漢出版社，1979。 台北：財訊雜誌社，1987。	永漢叢書1 財訊叢書6
《女性經商成功秘訣》	台北：永漢出版社，1980。	永漢叢書5
《女人的國籍》（上·下）	台北：永漢出版社，1982。	永漢叢書9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5。 *初出處：《自立晚報》（1981.07.01- 08.13，10版）	允晨文化當代文學21-22
《富者的弱點：有錢有煩惱》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5。	允晨文化生活美學19
《濁水溪》 （〈濁水溪〉、〈客死〉）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5。	當代文選20
《我要活到77歲》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5。	生活美學21
《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	台北：不二出版社，1996。	文學精選1
《台灣物語》	台北：不二出版社，1996。	文學精選2
《香港》 （〈香港〉、〈檢察官〉）	台北：允晨文化出版社，1996。 （香港：博益出版公司，1996）	允晨文選25
《商業的原則》	台北：健行出版社，1997。	現代企業經營寶典4初版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越境する中国文学』編集委員会編集，《越境する中国文学——新たな冒険を求めて》（日本東京：東方書局，2018.02）。
- 丸川哲史，《台湾、ポストコロニアルの身体》（日本東京：青土社，2000.06）。
- 小谷野敦，《文学賞の光と影》（日本東京：青土社，2012.10）。
- 川村湊，《川村湊自撰集 アジア植民地文学編》4卷（日本東京：作品社，2015.10）。
- 中古治夫，《大衆文学への誘い 新鷹会の文士たち》（日本東京：文藝社，2006.05）。
- 中島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編，《台湾近現代文学史》（日本東京：研文出版社，2014.12）。
- 尹健次，《「在日」の精神史1 渡日・解放・分断の記憶》（日本東京：岩波書店，2015.09）。
- 王育德，《我生命中的心靈紀事》（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07）。
- 岡崎郁子著，葉笛、鄭清文、涂翠花譯，《台灣文學——異端的系譜》（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01）。
- 邱永漢，《私の金儲け自伝》（日本東京：徳間書店，1971）。
- ，《邱永漢短篇小說傑作選——見えない国境線》（日本東京：新潮社，1994）。
-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賺錢自傳：賺錢秘密的洩露》（台北：永漢出版社，1979）。
- ，朱佩蘭譯，《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台北：永漢出版社，1979）。
- ，朱佩蘭譯，《濁水溪》（台北：允晨出版社，1995.08）。
- ，朱佩蘭譯，《我的青春・台灣 我的青春・香港》（台北：不二出版社，1996）。
- 邱貴芬，《台灣政治小說選》（台北：二魚文化事業公司，2006.08）。
- 垂水千惠著，涂翠花譯，《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出版社，1998.02）。
- 洪淑苓、黃美娥主編，《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

- 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7.05）。
- 郭南燕編著，《バイリンガルな日本語文学——多言語多文化な》（日本：三元社，2013.06）。
- 陳銘城，《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11）。
- 葉石濤，《從府城到舊城——葉石濤回憶錄》（台北：翰音文化公司，1999.09）。
- 塩見俊二著，日本文教基金會編譯，《密錄・終戰前後的台灣》（台北：文英堂，2001.11）。
-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06）。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 王惠珍，〈析論七〇年代末台灣日語文學的翻譯與出版活動〉，《台灣文學研究學報》20期（2015.04），頁251-290。
- 老頑固（吳濁流），〈借問！邱永漢先生〉，《台灣文藝》39期（1973.04），頁1。
- 吳佩珍，〈邱永漢的文學路——「直木賞」獲獎前後〉，《台灣文學館通訊》52期（2016.09），頁12-16。
- 李昀瑾，〈自我認同的糾葛與分裂：以邱永漢《濁水溪》為考察對象〉，《台灣文學評論》8卷1期（2008.01），頁6-19。
- 李魁賢，〈文學家才是一流的心靈〉，《笠詩刊》186期（1995.04），封面。
- 和泉司，〈邱永漢「濁水溪」から「香港」へ：直木賞が開いたものと閉ざしたもの〉，《日本近代文学》90集（2014.05），頁77-92。
- ，〈国共内戦」と日本、その時の邱永漢：「長すぎた戦争」を中心に〉，《社会文学》41期（2015），頁19-33。
- 邱永漢口述，楊森整理，〈我是台灣出生的亞洲人 只有故鄉、沒有國家的新文化時代〉，《財訊》267期（2004.06），頁74-77。
- 張季琳，〈邱永漢と林獻堂——小説〈客死〉をめぐる〉，《天理台灣學報》27號（2018.06），頁43-65。
- 陳思宇，〈陳舜臣——跨越國境、難以歸類的臺裔日籍作家〉，《台灣文學館通訊》52期（2016.09），頁17-21。

著者不詳，〈大眾文藝募集小說入選作《密入国者の手記》作者略歴と推薦〉，《大眾文藝》14卷1號（1954.01），頁23。

——，〈文藝時評〉，《大眾文藝》14卷2號（1954.02），頁65。

——，〈文藝時評〉，《大眾文藝》14卷11號（1954.11），頁48。

（二）學位論文

王永婷，〈生於台灣的亞洲人邱永漢：以《濁水溪：邱永漢短篇小說選》為例〉（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7）。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8）。

邱麗敏，〈二二八文學研究：以戰前出生之台籍作家對「二二八」的書寫初探〉（新竹：新竹師範學院進修暨推廣部教師在職進修台灣語言與語文教學碩士班，2003）。

三、報紙文章

于衡，〈聽邱永漢聊天〉，《聯合報》，1972.04.04，3版。

王文龍，〈繪畫沙漠之上 已經出現綠洲 邱永漢的求美畫廊正在起步 巧妙耕耘培育必有豐美收穫〉，《自立晚報》，1977.03.23，5版。

仲正，〈可悲的女人——〈敗戰妻〉〉，《台灣日報》，1978.03.29，12版。

巫，〈永漢國際書局 日前開幕設備新型〉，《自立晚報》，1979.08.18，9版。

著者不詳，〈台省籍作家邱永漢在日被提名受獎〉，《聯合報》，1956.01.25，3版。

——，〈十四年鄉土之戀 重回故里興奮親切 在日聲名極盛·開闢投資教室／高級財務顧問·家喻戶曉之士〉，《聯合報》，1972.04.03，3版。

——，〈從小說寫到食譜 邱永漢著作等身〉，《聯合報》，1972.04.03，3版。

劉復興，〈文壇健筆·經濟長才！邱永漢譽滿東瀛 做生意件件成功·從餐館到大企業／寫文章樣樣精通·小說贏得直木賞〉，《聯合報》，1972.04.03，3版。